

試論先秦諸子寓言中的「宋人」形象

王奕然*

摘 要

在本文中，筆者考察《孟子》、《莊子》、《韓非子》，以及《呂氏春秋》等書，探析其寓言中的「宋人」形象。作者們不約而同地賦予「宋人」一種負面的、愚笨的形象，然而，同樣是愚者形象，卻導因於不同的性格特徵：一是短視近利，識見不明；二是因循守舊，不知變通；三是不聽勸告，親內疑外；四是見事不明，未知其故；五是敝帚自珍，得意洋洋；這類的「宋人」故事，雖多半出於諸子作品，然而，其影響層面卻不侷限在哲理典籍，對後世文學創作來說，亦是提供了極佳的書寫素材。

關鍵詞：宋人、先秦諸子、寓言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生。

On the “song—ren” of Pre—Qin fables

Yi- Jan Wang

Abstract

This discourse is about the “song—ren” images in Pre—Qin Zhuzi’s fables. The authors of fables dowered “song—ren” with apish images. The apish images are due to different dispositions. Firstly, the apish image of “song—ren” is due to mercenary disposition. Secondly, the apish image of “song—ren” is due to fogeyish disposition. Thirdly, the apish image of “song—ren” is due to that he do not act on other people’s advices. Fourthly, the apish image of “song—ren” is due to that he can not find where the shoe pinches. At length, the apish image of “song—ren” is due to that he glories in culch.

Keywords : song—ren, Pre—Qin Zhuzi, fable.

一、前言

李富軒等學者在《中國古代寓言史》中，曾界定寓言的三項特徵，一是短小故事，二是虛構性，三是勸誡諷喻性，¹前者是形式上的特色，後兩者則是內容上的特色。在先秦諸子的作品中，往往透過編造的情節或虛構的人物，表達該思想家所欲闡發的義理思想。這種「人物象徵」式²的寓言，主要有幾種類型，一是將歷史人物套入編造的故事之中，如《莊子》書中的孔子、顏回等人。一是更動歷史事實，人物和事件雖然為真，然而，相關的言行與發生順序，卻與史實不同，如《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孔子相衛」一段，子臯逃出，此是史實，則跪放逃，則是虛構；再者，《韓非子·內儲說上》「叔孫相魯」一段，叔孫殺二子的先後次序，與《左傳》有所出入。一是藉由虛構人物的言行，傳達故事意涵，如《孟子》中的「齊人」故事。就第三種類型而言，這個虛構的人物，作者有時會冠以名號，如北海若、无名人等，有時則籠統地以國名冠之，³如鄭人、宋人等，而在諸子寓言中，多半賦予「宋人」一種負面的形象。⁴同樣是負面形象，卻展現了不同的性格特徵，所傳達的義理思維亦有差異。是故，在本文中，筆者企圖探析眾書對「宋人」的描述，並闡明作者藉由此一人格特質，展現了何種意涵。

二、先秦諸子寓言中的「宋人」形象

本論文欲探討的重點，乃是先秦諸子寓言中，所呈現的「宋人」形象。⁵此處的「宋人」，實是作者為了故事需要，所創造出來的虛構人物，不必真有其人。既然是討論虛構人物，筆者在選取材料時，便有兩個原則，一是有姓名者不取，如《莊子·列禦寇》的「宋人」曹商，《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的「宋人」屈穀

¹ 李富軒，李燕等著：《中國古代寓言史》，頁3。

² 吳春山：「象徵型寓言的類型最常見的是『人物象徵』與『事物象徵』，《莊子》書中兩類皆具，其他諸子則以人物象徵一類為多」，「就宋人（或鄭人）、孔子的蘊義而言，則屬人物象徵，分別代表著愚者與智者」，氏著：〈寓言的基本手法與情節的虛實性〉，《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報》第19卷第2期，頁15。

³ 湯力偉：「以人物為中心，並明確其國籍，這是中國寓言的一大特色」，氏著：〈先秦寓言中愚人形象分類及宋人居多的原因〉，《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25卷第1期，頁50。

⁴ 吳春山：「多數的寓言作者喜歡杜撰虛擬性的人物，有時甚至不冠以姓名，而以能體現其性格的特徵來予以命名，其中最常見的便是愚者與智者的形象，『揠苗助長』、『守株待兔』的宋人，都是愚者類型的名篇」，氏著：〈中國寓言文學的特色〉，《蘭陽學報》第3期，頁124。

⁵ 《戰國策·魏策三》雖亦有「宋人名母」的寓言故事，然而，本文考察的重點為先秦諸子作品，筆者便未將其列入討論範圍。

之類。一是載於史冊者不取，如《韓非子·喻老》有「宋人」獻玉給子罕之事，⁶同樣的內容，亦見於《呂氏春秋·孟冬紀》中，文字與情節略有增減。⁷此段故事乃是沿用《左傳》的記載，⁸主角與情節大致相同。筆者認為，既是源自史冊，便不可將故事中的「宋人」視作虛構的角色。

本論文所考察的諸子寓言作品，包括《孟子》、《莊子》、《闕子》、《韓非子》，以及《呂氏春秋》，至於《列子》，則未列入討論範圍。《列子》書中雖亦有許多寓言材料，如獻曝的「宋人」，以玉為楮葉的「宋人」，⁹好行仁義的「宋人」，密藏遺契的「宋人」等等，然而，現今學者對其作者的身份，仍舊眾說紛紜，若是魏晉之人所偽托，此書便不合乎本文討論的斷代。「宋人」雖是虛構人物，卻多半被賦予一種負面的形象，¹⁰藉由「宋人」之愚，凸顯故事的寓意。然而，先秦諸子何以不約而同地採用「宋人」一詞，作為「愚者」的代稱，對此，許多學者皆提出不同的見解。¹¹不過，筆者以為，正因諸子並未闡明箇中緣由，這些推論

⁶ 《韓非子·喻老》：「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為君子器，不宜為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受子玉為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楊家駱編：《韓非子集解等九種》，頁121。

⁷ 《呂氏春秋·孟冬紀》：「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為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頁552。

⁸ 《左傳·襄公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清·阮元校：《十三經注疏·左傳》，頁566。

⁹ 《列子·說符》：「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楊家駱編：《莊子集解·列子注》，頁90。此段故事亦見於《韓非子·喻老》與《淮南子·泰族》，內容大致相同。筆者以為，單憑此點，只能說明此故事並非魏晉人所新增，然而，若要就此斷定它出自先秦列禦寇之口，證據稍嫌薄弱。

¹⁰ 寓言故事中的「宋人」，多半呈現負面的形象，當然也有少數的例外，如《尸子》：「宋人有公斂皮者……」、《列子·說符》：「宋人有好行仁義者……」等，頁94……《尸子》之文，見於《太平御覽·資產部·屠》，宋·李昉等著：《太平御覽》，頁3615。

¹¹ 明代沈鯉《亦玉堂稿》曾點出「宋地史稱其俗近古，多溫中篤厚君子，而世又傳宋人之愚，如所謂守株以待兔之類，相與笑之……」的疑問，然而，他並未深究背後的原因。近代學者則提出不少意見，如陳麗珠：「除了《韓非子》之外，其他子書，如《孟子》、《莊子》、《列子》等均有以宋人形象為揶揄取笑的對象，應不是偶然的巧合，恐怕正是因為民族優越感與被征服者歧視的心態所使然。」氏著：《韓非子諸說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頁117、118。陳玲玉在《韓非子諸說事例研究》中，便整理了楊樹達、湯力偉、周勳初、公木等學者的說法，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歸納出五點原因：其一，宋有先王之遺風，其俗厚重多君子。戰國習俗輕薄譎詐，故視厚重之人為愚；其二，宋與楚

終究無法得到確切的驗證，實為可惜。總之，無論是巧合或基於某種原因，先秦諸子常以「宋人」指稱愚者寓言中的主角，藉著凸顯其蠢笨行徑，使讀者能心生警惕，避免犯下類似的錯誤。同樣是愚行，卻導因於不同的性格特徵，於下文，筆者便將先秦諸子寓言中的「宋人」形象，大致分為五種特質，並闡明作者所欲表述的寓意。

（一）短視近利，識見不明

「宋人」的第一種性格特徵，便是短視近利，識見不明，只顧眼前的利益，而無長遠的考量。如《孟子·公孫丑上》有謂：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¹²

在這段文字中，藉由公孫丑之問，孟子闡述自己與告子義理的不同，並解釋「浩然之氣」的定義。告子之道，言有不達，捨置其言，心有不得，強定其心，孟子則不然，志壹而帥氣，於心有所不安，反求諸己。孟子認為，仁義本具於心，養氣為輔道之方，「浩然之氣」充塞天地，善涵養者則能集義。孟子以「宋人」為喻，要人不可短視躁進，「宋人」擔憂秧苗之不長，用人力將其拔高，反而造成作物的枯槁。「宋人」只見短期之效，悖離事物之本性，用力愈勞，收穫愈少，如同世俗之人，未循正途，助長其氣，一味追求暫時性的成果，非但「無益」於體道，甚至損害其德。依孟子看，告子所謂「不動心」，並未回歸道德本心的自我覺察，僅是強制地、刻意地懸絕萬物，此種作法實是違逆人性之本然，正如「宋人」之揠苗，終將導致衰敗的後果。

交戰於泓，宋襄公拘泥禮義而敗，其行至愚，後人便將天下之愚，盡歸於宋；其三，宋因非姬姓國而受到歧視；其四，宋乃是商朝後裔最多之國，殷商為西周所滅，他們屬於亡國奴；其五，宋保存商朝文化禮節最多，但多迂腐而不合時宜。詳見氏著：《韓非子儲說事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頁114、115。

¹²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231、232。

《莊子·逍遙遊》記載了惠子和莊子的兩段對話，在第一段對話中，莊子便以「宋人」爲喻，說明世俗之人的短視近利。對話的內容如下：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澣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以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澣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澣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¹³

在這段文字中，惠子與莊子的爭論點，在於「大瓠」是否有用。惠子從世俗的觀點出發，認爲大瓠之堅，不能自舉，大瓠之大，無器可容，並無實用性可言，故稱其「無用」。觀惠子之言，乃是從功利的角度著眼，至於莊子，則是跳脫世俗執見，認爲大瓠之大，必有可用之處，所謂的「用」，並不侷限於功利價值。「宋人」有不龜手之藥，將其應用在漂打絲絮上，此是「用」之小者，客購得其方，應用在水戰之上，此是「用」之大者。「宋人」貪圖百金而賣方，此是「利」之小者，客損百金而得封地，此是「利」之大者。「所用之異」，得到的報酬便有不同，「宋人」短視近利，得百金而錯失巨利，不亦愚哉！依莊子看，惠子執著於「用」之小者、「利」之小者，與故事中的「宋人」並無不同。莊子所謂「大用」、「大利」，乃是將大瓠做成大樽，浮乎江湖，看似無用，實顯其「無用之用」。這裡的「用」與「利」，已經超越世俗的層次，不以功利爲評斷標準，由「道」觀之，逍遙自適，遊乎無何有之鄉，廣陌之野，此乃真正的大用。¹⁴

在《呂氏春秋》中，亦以「宋人」爲喻，規勸國君不可爲了追求短期成效，因而使用錯誤的治國策略。〈離俗覽〉有謂：

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鵲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

¹³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見《莊子·逍遙遊》，頁36、37。

¹⁴ 同樣的思維，亦見於《人間世》中，匠石從功利的角度批評櫟社樹，「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樑，以爲柱則蠹。」，《莊子·人間世》，頁171。莊子則藉由櫟社之口，闡明「不材」之大用，與《逍遙遊》的惠、莊對話，意旨接近。

倒而投之瀾水，如此三者。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亡國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太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¹⁵

趕路的「宋人」，只在乎短期成效，爲了迅速抵達目的地，一再使用威逼的手段，若是馬匹稍有抗拒，便將其溺於瀾水之中。「宋人」溺馬於水，汰舊換新，並無絲毫愛惜之情，作者認爲，不肖之君王與「宋人」相似，如果國君喪失「愛利之心」，行威攝，施刑戮，使用錯誤的方法，非但得不到民心，反而會造成自身的衰亡。適當的鞭策，如同「鹽之於味」，可以收到絕佳的效果，一旦過度，馬匹必然力竭而死，君之治民，亦是如此。君主放棄利勢的權柄，只採取高壓的恫嚇手段，這種治國方式，短時間內雖有成果，卻非經世之正道，百姓積怨日深，勢必有所反撲。

（二）因循守舊，不知變通

「宋人」的第二種性格特徵，便是因循守舊，不知變通，拘泥於古代典籍，或是過往的成見。在《莊子·逍遙遊》中，莊子以「宋人適越」之事，作爲負面例子，要人捨棄自身的成見，藉此闡明「無己」的至人境界。其文曰：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¹⁶

「宋人」以販賣章甫營生，到了越國做生意，才發現越人的風俗乃是「斷髮」，帽冠毫無用武之地。「宋人」之愚，便在於「有己」，固守過去的想法，認爲己之所用，必爲彼之所悅，並未深入瞭解越國的習俗。依莊子看，世俗之人往往拘泥於舊有的認知、既定的立場，以己度人，與「宋人」並無不同。莊子藉由此喻，反面逼顯出「至人」的樣貌，唯有跳脫固有的思維，與物相冥，方可達到無己無待的體道境界。所謂的「至人」，居無所思，行無所慮，順物而無容私，故能遊世而不僻，得洞見之真。

¹⁵ 《呂氏春秋·離俗覽》，頁 1271。

¹⁶ 《莊子·逍遙遊》，頁 31。

在《韓非子》中，亦以「宋人」守舊而不知變通的性格特徵為喻，抨擊世俗一味地效法「先王之言」的弊病。於書中，這類的故事共有三則，兩則在〈外儲說左上〉篇，一則在〈五蠹〉篇。《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的體例，乃是先述六則「經」，再列六則「傳」，以及諸多故事作為佐證。「經三」有言：

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播吾之迹，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得車厄也，衛人佐弋也，卜子妻寫弊褌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所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所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¹⁷

韓非認為，後代之人對於「先王之言」，往往無法有適切的理解，一者，時間相隔既久，未必能充分掌握原意；再者，個人認知有異，不同的思想家，或許會有不同的詮釋。即便能深契其意旨，「先王之言」適用於古代，卻未必宜乎今世，古今風俗既異，施政方針自然要有所調整，事因於世，備適於事。因此，依韓非看，若拘泥於「先王之言」，倣效前人的法度，不啻是愚者的行徑。他以「宋人」為喻，佐證其言：

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¹⁸

又謂：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

人曰：「是何也」？

對曰：「書言之，固然」。¹⁹

在第一段文字中，「宋人」想要學習禮貌，卻盲目地倣效對方的行為，長者乾杯，他也要跟著乾杯，並未考慮到自己的酒量。故事中的「宋人」，呈現出一種缺乏主見的盲從形象，只是一味地模仿他人做過的動作，而沒有探究「效善」與「飲無餘」之間是否具有關連性。在第二段文字中，「宋人」閱讀典籍，拘泥於表面上的字義，造成錯誤的理解。「宋人」對典籍的意旨認識不清，僅是一味地墨守

¹⁷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頁196。

¹⁸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頁208。

¹⁹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頁208。

書中的文字，呈現出一種不求甚解的治學態度，以及欠缺判斷能力的愚者形象。這兩則故事，皆呼應「經三」所欲闡發的要旨，後代之人觀「先王」言行，若是缺乏主見與判斷能力，其愚無異於「宋人」。墨守「先王」之行，正如乾杯的「宋人」，僅是學其形貌，不見其本。拘泥「先王」之言，正如治學的「宋人」，往往容易錯解其義，盲目模仿，愈顯其言，其道愈晦。在〈五蠹〉篇中，亦藉由「宋人守株」之事，批評「效法先王」的主張，其謂：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²⁰

韓非認爲，世異則舉措不同，適用於上古的方法，未必宜乎當代，聖人治國，乃是與時俱進，事異則備變，考量現今之所需，絕非一味地遵照過去的典籍，以及既有的法度。兔子偶然撞到樹樁而死，「宋人」見之，卻誤以爲只要固守原處，便能捕獲新兔，終究是徒勞無功。「先王」之政在古代，或許帶來不錯的成效，儒者「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²¹然而，這種效果究竟是偶然如此，還是必然如此，並不容易分辨。依韓非看，欲以「先王」之政，治今世之民，便如同守株的「宋人」，捨棄可以掌握的必然，而等待不可知的偶然。辛勤農耕，帶來收成，此是必然，守於樹樁而得兔，此是偶然；世遷而治異，此是必然，效上古之陳迹，法先聖之舊制，得平治之效，此是偶然；若是盲目地遵奉「先王」之言，因循前賢之行，正是棄必然而就偶然，如同「宋人」，冀能得兔，兔不可復得。

（三）不納善言，親內疑外

²⁰ 《韓非子·五蠹》，頁339。

²¹ 《韓非子·顯學》，頁356。

韓非在〈說難〉篇中，剖析了遊說的種種困難，以及可能遭遇的險境，並列舉諸例，讓讀者容易理解其說。其中，他借「宋人」為喻，呈現出一種不聽勸告，親內疑外的性格特徵。其言：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²²

觀此段文字，韓非利用兩個故事說明「處知」的困難，前者是史事，後者是虛構。〈說難〉開篇即言：「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而是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²³難處並不在於學識與口才，而在能否契合對方的心理。鄭武公欲伐胡國，卻以其女妻之，正是「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²⁴表面上是與胡君交好，實則另有圖謀。關其思衡量局勢，認為胡國可伐，卻被君王當作欺敵的棋子，非是他學識不足，誤判敵情，實乃未能掌握鄭公之心，故遭致殺身之禍。「宋人」之牆壞，鄰人好意提醒，卻未獲採納，亡財之後，反而遭到懷疑，非是鄰人識見不明，實乃未能掌握人性。韓非認為，人性本是親內而疑外，同樣的話，出自其子則得譽，出自鄰人則招疑，「知之」容易，「處知」卻難。關其思和鄰人的諫言，皆能洞察事理，切中肯綮，事後亦得到證明，鄭公果然伐胡，「宋人」之家果然遭盜，兩人之所以得禍，只因未能通曉人心。韓非藉著這兩則故事，闡明言說之難，一者是借用史事佐證其論點，一者是透過虛構的「宋人」，表現出一種多疑猜忌的形象。

（四）見事不清，未明其故

「宋人」的第四種性格特徵乃是見事不明，往往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在《韓非子·外儲說右上》中，先列「經」篇三則，再述「傳」篇三則，且徵引史事與寓言加以佐證。內容主要是闡發人主操控群臣的三種方術，「經一」言除患，剷

²² 《韓非子·說難》，頁64、65。

²³ 《韓非子·說難》，頁60。

²⁴ 《韓非子·說難》，頁61。

除權勢難以節制的大臣；「經二」言隱藏好惡，不讓臣下有揣摩君心的機會；「經三」言違情而全法，執法不避親，戮奸不容情。於「傳三」中，韓非以「宋人」為主角，描述一個賣酒者的故事，觀其意旨，乃是欲證成「經三」的論點。「經三」有謂：

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姬也。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顓頊，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²⁵

觀此段文字，韓非的記載與史實有所出入。首先，按照《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所言，齊國攻魯，魯君欲重用吳起，卻因其妻為齊人，而有所疑慮。吳起欲獲權位，遂以「殺妻」來換取君主的信任，終得以擔當魯將，大破敵軍。韓非徵引的故事則云，因吳起之妻所織的絲帶，不合乎他當初制定的尺寸，故「出」其愛妻。再者，按照《左傳》所言，晉侯圍曹，顓頊違反文公之令，焚燒曹國大夫負羈的居所，晉文公便下令斬殺顓頊以示眾。韓非徵引的故事則云，文公相約田獵，嚴令遲到者以軍法從事，因顓頊過時方至，便將其腰斬，以徇百姓。文字記載雖然不同，所表達的意旨卻很相近，即便是妻子與近臣，兩人為了昭公信，示法度，皆可毅然捨棄過往的情誼。韓非藉由這些例證，說明欲成大功者，必能忘棄私情。他認為，君主治國亦應如此，除疽必先忍痛，治世必先廢私，國君唯有秉公處事，不護親，不愛寵，方能顯明其術。

在「傳三」中，韓非以「猛狗」比喻奸佞之臣，故事裡的「宋人」，仍舊是「愚者」的形象，遇事而難明其故，得到他人指點，方能領會問題的癥結處。故事的內容為：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罍而往酤，而狗逐而齧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為己者必利，而不為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為猛狗而齧有道之士矣……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²⁶

觀此段文字，「宋人」賣酒，物美且待客和善，銷量卻不甚理想，日久而酒漸酸

²⁵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頁 232。

²⁶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頁 241、241。

敗。他遭遇此一情況，難明其因，便求教於長者楊倩，方知買酒之人皆畏其犬，故不願接近。於故事中，「宋人」與楊倩，一愚一智，「宋人」見事不明，當局者迷，楊倩則是旁觀者清，能夠直截地點出問題的關鍵所在。狗之習性，見生人則頻吠，甚至有攻擊對方的可能性，「宋人」身為飼主，馴養既久，自然不會遭到威嚇、嚙咬。正因如此，「宋人」受到它平日溫順態度的蒙蔽，並未發覺其狗之「猛」，故無法確知酒滯銷的真正理由。「宋人」待客親切，其酒品質亦善，卻因猛狗齕人而做不成生意，實乃因小而失大，因私而廢公。韓非認為，國君如同「宋人」，其德雖佳，卻容易遭到親近臣子的蒙蔽，致使有道之士不被重用。親近之臣，則如故事中的「猛狗」，於人主跟前，表現溫順的態度，實則暗中剷除異己，誅殺賢良，此即國家敗亡的主要原因。這個故事乃是要證成「經三」之要義，希望君主能有所警覺，杜絕近臣「執柄而擅禁」，即便是至親之人，逆亂則誅，有過必懲，悖情而全法。依韓非看，這個故事正好可以作為統治者的殷鑑，縱其猛犬而逐客，生意必然每況愈下，萬乘之主若不能體察臣下之「惡」，一味地徇私袒護，甚至將生殺大權交付其手，「國焉得無亡乎」！

（五）敝帚自珍，得意洋洋

在《闕子》書中，記載了一則「宋人」故事，藉由他的言行，呈現出一種好利的愚昧形象。其文曰：

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齋七日，端冕之衣，釁以特牲，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俯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殊。」主人父怒曰：「商賈之言，豎匠之心！」藏之益固，守之彌謹。²⁷

「宋人」偶拾燕石，未明其價值，卻自以為得寶，四處向人炫耀，有識之客加以譏諷，他不但沒有醒悟，反而固執己見，遷怒於人。明明是無用之物，「宋人」卻視若珍寶，謹慎收藏，唯恐遭到盜竊，作者乃是藉由此故事，嘲笑世人見識之狹隘，執著於廢棄之物，卻大肆張揚，沾沾自喜，徒然為識者所譏耳！²⁸

²⁷ 宋·李昉等著：《太平御覽》，見《太平御覽·地部·石上》，頁366。

²⁸ 類似的故事，亦見於《列子·說符》中，寓意大致相同。《列子·說符》：「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頁100。

三、結論

《文心雕龍·夸飾》有謂：「因誇以成狀，沿飾而得奇」，²⁹作者在描寫故事人物言行時，爲了讓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常將其誇張化、鮮明化，先秦諸子對愚者寓言的處理手法，正是如此。他們藉由誇張的情節，凸顯「宋人」之愚，希望讀者能引以爲鑒，避免犯下同樣的錯誤。在本文中，筆者考察《孟子》、《莊子》、《韓非子》，以及《呂氏春秋》等書，探析其寓言中的「宋人」形象。作者們不約而同地賦予「宋人」一種負面的、愚笨的形象，然而，同樣是愚者形象，卻導因於不同的性格特徵。

一是短視近利，識見不明，《孟子》中的「宋人」揠苗助長，反而扼殺其苗；《莊子》中的「宋人」，貪圖百金之小利，反而喪失獲得封地的機會；《呂氏春秋》中的「宋人」，爲了短期的成效，不停地鞭策其馬，終將造成馬匹的衰亡。二是因循守舊，不知變通，《莊子》中的「宋人」，欲前往越國販賣章甫，卻未事先調查對方的風俗，陷於「有己」之心，生意自然難成；《韓非子》中的「宋人」，無論飲酒或解書，皆是一味地模仿前人，偶有所得，便墨守舊法，不思改變，冀能復得，徒增他人恥笑。三是不聽勸告，親內疑外，《韓非子》中的「宋人」不採納鄰人的建議，終於嚐到苦果。四是見事不明，未知其故，《韓非子》中的「宋人」寵愛其狗，卻不知它便是造成生意慘淡的主因，越是縱容其犬，客人越是不願光顧。五是敝帚自珍，得意洋洋，《闕子》中的「宋人」，執著於無用之棄物，到處對人炫耀，不亦愚哉！這類的「宋人」故事，雖多半出於諸子作品，然而，其影響層面卻不侷限在哲理典籍，對後世文學創作來說，亦是提供了極佳的書寫素材。³⁰

²⁹ 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頁292。

³⁰ 分類言之：「揠苗」故事亦見於嵇康《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張泰《學殖賦》、李程《揠苗賦》、楊濤《揠苗賦》、陸龜蒙《南涇漁父》、方岳《頤齋記》、王邁《武帝論一》、歐陽守道《三勿堂記》、劉因《偶書》、吳萊《形釋》、謝遷《哀池魚三十韻》、胡松《刻良知議辯序》等。「不龜手之藥」故事亦見於汪藻《謝授新安郡侯表》、鄭浩《策問》、陳鵠《耆舊續聞》卷六、陳傅良《法無善惡在人所用》、劉宰《贈芮醫》、崔敦禮《苦寒賦》、吳澄《贈李庭玉往岳州序》等。「販章甫」故事亦見於崔咸《良玉不琢賦》、謝枋得《薦寫神黃鑑堂》、王義山《送宋童子序》、盧柟《上郝南峰吏部書》等。「紳束」故事亦見於劉鋹《減惑論》。「守株」故事亦見於葉應龍《北園祠堂記》、沈鯉《歸德府學記》、陸深《效法》等。「天雨牆壞」故事亦見於趙泉虬《天雨牆壞判對》。「犬猛酒酸」故事亦見於孔融《報曹操書》、周麟之《代七兄監酒謝湯潛啓》、李俊民《悼犬》等。「寶燕石」故事亦見於庾信《周上柱國齊王憲神道碑》、陳子昂《觀荆玉篇》、李白《送薛九被讒去魯》、俞德鄰《古意八首》、胡布《詠石》、《有感》、《學劍》、張達《詠懷其五》、劉基《書爲善堂卷後》、彭大翼《胡盧》、劉球《送河南參議宋君赴任序》、胡翰《送趙子將赴北序》、胡奎《感遇》、李孟璿《擬古》、朱彝尊《說硯》等。「拾遺契」故事亦見於柳宗元《與李睦州論服氣書》、晁補之《上皇帝論北事書》、程瑛《謝李尚書》、劉壘《答友人論時文書》、王立道《巧拙辨》等。「楮葉」故事亦見於晁補之《七述》、王世貞《國朝詩評》。「好行仁義」故事亦見於張元凱《齊居雜詠》。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按時代排序）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臺北：鵝湖出版社，2003年。

宋·李昉等著：《太平御覽》，臺北：新興書局，1959年。

宋·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

宋·阮元校：《十三經注疏·左傳》，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

二、近人論著（按作者姓名筆劃排序）

李富軒，李燕等著：《中國古代寓言史》，臺北：志一出版社，2001年。

吳春山：〈中國寓言文學的特色〉，《蘭陽學報》第3期，2004年7月，頁121-129。

——：〈寓言的基本手法與情節的虛實性〉，《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報》第19卷第2期，2006年9月，頁1-24。

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臺北：華正書局，1988年。

陳麗珠：《韓非子儲說研究》，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4年12月。

陳玲玉：《韓非子儲說事例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6月。

湯力偉：〈先秦寓言中愚人形象分類及宋人居多的原因〉，《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25卷第1期，2001年2月，頁49-51。

楊家駱編：《莊子集解·列子注》，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

——：《韓非子集解等九種》，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

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臺北：崧高書社，1985年。